



帝国 回忆

THE  TIMES 的

《泰晤士报》
晚清改革观察记

《泰晤士报》著 方激 编译

THE EMPIRE MEMORIES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014036325

K256.06
03

帝国 THE TIMES 的 回忆

《泰晤士报》
晚清改革观察记

《泰晤士报》著 方激 编译



k256.06
03



北航

C1715814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78 articles from The Times by staff writers from 1901 - 1911
Copyright © The Times / News Syndic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3) 第18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 / (英) 泰晤士报 著;
方激编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9-07465-4

I. ①帝… II. ①泰… ②方…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清后期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3704号

帝国的回忆

DIGUO DE HUIYI

[英] 泰晤士报 著

方激 编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夏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徐宪江

特约编辑: 王方

营销编辑: 刘菲

责任印制: 杨宁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购书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5.75 字数: 280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2003年夏天，我在出国留学九个春秋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面对满目翻天覆地的巨变，我的心情远远无法以“心潮澎湃”来形容。

贵为门户之地的上海，改变早在我出国之前就已成型，并不令人有太多惊喜。但是当我回到合肥探望父母时，才惊觉，原来改变远远不是几个大城市才有的专利，中国正在变化的事实是明显的、全局的、宏观的，无论是气势还是实质，均是如此。合肥并非我的祖籍或出生地，但从求学年代起，我便跟随着在此地工作的父母，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在我的认知中，若谈起模糊的“故乡”概念，这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始终是第一位的。

某个酷暑的夜晚，母亲领着我们去逛久违的淮河路步行街。当步行至三国时代曹操点将的“教弩台”（后亦称“明教寺”）和张辽大战东吴的“逍遥津”近旁时，我惊喜交加地看到了“李鸿章故居”。回想当年，我的初中母校就在距离淮河路不远之处；许多年后，我还曾在距离当地咫尺之遥的一间公司里短暂地工作过。对于淮河路近旁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景点，我都异常熟悉，但是这么多年来，却从来不曾知道，李鸿章的故居原来就藏在那层层叠叠的街巷之间，并且藏得如此云淡风轻，如此不着痕迹，如此讳莫如深。

夜色中，匾额上那黑漆为底、金漆书写的“李府”二字，在故居大门前两盏大红灯笼晕染而开的一片红光中，显得赫然醒目。那一刻，我突然想，在这个变化的年代里，李鸿章应有的地位和评价，是否已真的被公正诠释？而由他

为代表人之一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否已真的在还原之中？

犹记当年在大学求学之时，每每有来自各地的同学询问出自合肥的著名历史人物时，我都如数家珍，远一点的有包公、杨行密，近代的有刘铭传、聂士成、段祺瑞，当代的有龚澎、杨振宁。然而，对于最为世人熟知的合肥人李鸿章，我却始终不愿提及。在我们当年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中，能和李鸿章之间画上等号的，似乎唯有人人避之不及的“卖国贼”一词。

那次回国，行程杂乱而匆忙。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踏入“李府”的大门。

直到三年后再次回国省亲，在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才终于带着还愿的心情，独自前往李鸿章的故居参观。修缮一新、前后五进的“李府”，据说只是当年真正李家大院的一小部分而已。庭院深深，门槛重重，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整座庭院在逼仄的空间中，时见别有洞天的开阔；两层木制，四围相连，正是旧时江南传统中国士绅家庭典型宅院的建筑结构。而最吸引我眼光的，还是过厅正中屏风上方高悬的那块匾额，上书的“钧衡笃祐”四字，据说这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由光绪帝亲笔御赐的手迹。“钧衡”指的是重臣，“笃祐”指的是厚福，光绪的这四字所指，无非是称李“官显福厚”，是君王给臣子的盛誉，也是赐福。

但历史却总是和人开着大玩笑。李鸿章的七十大寿在1893年，在那一年之前，他人生中的大半时光，确实可用“风光显赫”来形容。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入京会试，投曾国藩门下，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授翰林院编修。之后，便是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开始了和太平军、捻军的常年缠斗，其间，不止一次得朝廷封赏。1863年，在“不惑”之年中，他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正式开始创办洋务。其后，又出任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直至在1870年，因处理“天津教案”有功而调任直隶总督，后再兼“北洋通商大臣”。五十七岁时，他开始创设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试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天津武备学堂，奏请兴建卢汉铁路、关东铁路等事宜。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事，都是在他七十岁前完成的，因故，在大寿之时，得皇帝封赏“钧衡笃祐”四字，可谓实至名归。倘若李鸿章与他的恩师曾国藩一样，就此收手，一生大可落个功成身退的结局，而倘若真的如此，这淮河路上风光显赫的李府，谅不至于被冷落至今。

然而，从七十大寿之后的第二年开始，随着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李鸿章的命运也开始了真正的颠簸之途。那一年，他先被赏戴三眼花翎，却因甲午战败又被拔去。再过一年，他被授予“全权大臣”之名，赴日议和，其间受尽屈辱，终签下同样“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过一年，他应俄国的要求，代表清政府参加了沙皇的加冕典礼，并周游欧美各国，虽在所到之处受到礼遇，但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却令东三省从此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1901年，即“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的第二年，他再一次被逃至西安的朝廷“请出山”来收拾残局，与八国签订了为后人更加诟病的《辛丑条约》。就在签订此条约后不久，李鸿章魂归西天。

如今，历史爱好者们对于李鸿章的这段历史早已不再陌生。我第一次对它有全面、周详的了解，始于1995年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之后。当时，我还在美国的某大城市求学，因互联网技术刚刚起步，网上几乎无从找到中文资源，随身带去的中文书里，除了大学时用过的教科书，只有两本可以稍稍慰藉心灵的“闲书”，因为每晚放在床头翻阅，早已被我翻得卷了毛边。后来，我在台湾人的“华侨文教中心”里觅得不少历史书籍，如获至宝，其中除了这本单本印刷的《李鸿章传》，还有任公先生的《饮冰室合集》、全套《清史稿》、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部分集卷等等。虽然当年课业繁忙，但只要能抽出些许闲暇，我总爱去那里待上一会儿。囫圇吞枣地翻阅几章，一段日子下来，感觉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如今回想，那时翻阅到的不少资料，可能在当年国内中小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都不容易觅到。

在张文襄公和任公先生对于李鸿章的评传中，常直接以“合肥”二字来称谓李中堂本人。以原籍代替人名的用法，是不少前代文人在行文中的一大特色，本不稀奇。但我每每读到“合肥”二字，联想到它叙说的却是李鸿章其人，两个概念因为互补而带给我的冲击力却是格外奇妙而强烈。“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在《李鸿章传》中，最后的结语部分“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最能鲜明突出李中堂鲜明的个人特色和他对于当时中国时局巨大的影响力。的确，李中堂不仅是“大清帝国”最后七十年的一大支柱，也应该是合肥的一大骄傲。

而这本《李鸿章传》带给我的影响力，也远不止于对合肥人李鸿章个人的重新认识。它是某种开端，很自然地让我萌生了想要了解他所处年代整个变局

的兴趣。既然历史存在着可以被重新解读的可能性，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而支撑真相的细节又在哪里？

任公先生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几句充满苍凉与不忿的评语，此后一直深深烙印在我心田。想起李鸿章，总仿佛看到一个高大清癯、形单影只的背影，叠映在一个个历史画面中。那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老者，在无可奈何的时局与潮流中，为了他所效忠的朝廷，身负骂名，勉力一搏却又无力真正挽回什么的背影。他说过，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在他裱糊了一辈子的大厦将倾之时，虽仰天长叹“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却还是毅然选择了“不识时务”之道，我不知道该以什么确切的词语来形容这种选择，但它却令我肃然。

拜访李府后的那几年间，我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一批新时代的史学家身上。感谢他们探寻真相、还原历史的决心、恒心和信心，感谢他们从泛黄、褪色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更多的历史细节。在他们的笔下，自民国以后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被刻意忽略、扁平化乃至丑化的晚清变局，终于以一番新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所有像我一样的好奇者面前。

说起本书的成形，由来其实颇为偶然。2011年的上半年，为了跟踪阅读一位著名学者的思想和文字，我在某网站开设了一个微博账号，在那里，巧遇了年轻的新锐历史学者兼出版社编辑李刚先生，但彼此本无甚交集。某一日，他突然来信，询问我人在海外，是否方便找到一些以海外观点审视晚清历史的资料。很快，我们便一起想到了最为脍炙人口的英国《泰晤士报》——这份创刊于1785年的英国报纸，随着晚清年代里英国在华利益的不断扩张，将其新闻触角不断地向中国的各个角落延伸。这种延伸的直接效应之一，便是它的史学参考价值。可以说，对于晚清的时局、动态和人物走向，《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是观察最为细致入微，也最具信服力的两大英文报纸。两份报纸中的不少新闻稿，为今人了解当年的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刚询问我，可否从中挑选一部分内容翻译出来。对于这个提议，我则犹豫不决了好久，毕竟，中学以后，我不再有机会在课堂上学习过一天历史。虽然十几年来，作为某种个人爱好，我始终在翻阅有关的书籍、资料，但作为一门学科，毕竟对历史缺乏整体且专业性的了解；我甚至非文科出身，少年时代在汉语文字上打下的一点根基，随着近二十年的海外生活，也在一天天地消磨

殆尽。但李刚却一再鼓励我，可以先作尝试，再行决定。于是，我试译了三篇，未曾想他给我更大的鼓励，诚恳之词终于使我下了决心。

《泰晤士报》有关中国晚清的报道浩如烟海，以我个人之功，绝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如数译出。那么，就必须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并以这个主题来挑选出合适的文稿。几经斟酌，尤其经过李刚的指点，我决定在清朝最后11年的“新政”上“作文章”，原因在于，首先，这11年代表了“大清帝国”告别历史舞台前的最后形象，其中牵涉的事件、人物，尤其是“新政”的失与得，都与紧承而上的民国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再者，因为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一切外显的前因后果，这段历史，尤其是当年所谓“预备立宪”的动机和尝试，对于启迪后代、引发国人的反思和警醒别具意义。所以，将清朝的这最后一个“大动作”中的若干细节放大来看，我们可能会更清晰地看到历史潮流的趋势、朝代更替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第三，“新政”的第一年，也恰是李鸿章去世的那一年，作为李鸿章经营半生的洋务运动的结果，“新政”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对洋务运动的深化和扩展，在这一点上，算是包含了我的一点个人私心吧。而同时，因为李刚本人就曾写过脍炙人口的《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一书，我想，译文中若有任何疏漏之处，他正好可以帮助修改、指正。

在2011年7月至11月的三个半月时间里，为了编译此书，我经历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有激动、亢奋，也有低落、迷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大半的时间都交付在了这部书稿里，支撑我坚持到最后的，除了李刚不时关切与询问，还有一种完成“自我启蒙”的期许，因为我同样渴望从这些泛黄的篇章中，了解到历史的真相和细节。

不可否认的是，报纸是国家利益的喉舌，其报道、评述的视角，不可避免地会以本国的利益为切入点，在这一点上，《泰晤士报》绝不会例外。但我觉得，还原历史，需要参考方方面面的史料，即使每一份史料都带着明显的主观色彩，但当越多资料摆放在一起时，其中的客观色彩就会越发明显、清晰，正仿佛一幅巨大的拼图，其中的单独一片或许不具备太多意义，但联为一体时，画面的含义却变得不言自明。

本书选译了数十篇由《泰晤士报》所发表的、自1901年至1911年11年间有关“大清新政”的新闻稿，体裁包括报道、评述、专访等，内容则涵盖了与“新政”有关的方方面面，包括清廷在教育、官制、货币、财政、报界、铁路

建设、司法、军队、警察、外交、禁烟、医学、成立议会等方面改革的尝试，付出的努力，其间的所失与所得，并试图从事件的本身来推论其后的因果关系。这11年的前5年中，因为“新政”的缓行，可资参考的内容不多，故每一年只收录四五篇相关的新闻稿；1906年，因为“五大臣西洋宪政考察”归来，清廷宣布了《仿行立宪上谕》，自此“改革”的动作明显多了起来，所以这些年份中收录的篇数也相应地有了增加，从每年六七篇到十篇以上不等。除了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新闻稿之外，也穿插了几篇时事报道，以期串起一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

虽然这些新闻稿宏观地概括了有关清末“新政”的诸多细节，但将它们放在一起时，却并不会成为一本体例完整的书；每一篇各自相对独立的稿件，也无法完整、清晰地交待所报道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为稍作弥补，我和编辑们在部分文稿前附加了一小段说明性的简短文字或页下注，以尽可能地对这些新闻稿中提及的人物和主要事件作一交代。而更为周全、详尽的资料、书籍，如今已可非常容易地找到，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朋友们可自行参阅。

此外，我对新闻稿中提及的所有姓名都作了细致的查证，其中有两篇涉及普通官员和百姓的姓名，因为无从查证其中文原名，故保留报道中的英文音译。对于涉及的外籍人士，则尽可能地使用了他们当年在中国使用或通行的汉名，并在注释中列出其原名。

因为涉及著作权的问题，此书在完成编译后延宕了一年有余的时间未能出版。直到重庆出版集团下属的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愿意为此书与《泰晤士报》交涉并获得出版权，本书才有了出版的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有幸经李刚的介绍而结识了该公司的徐宪江编辑。虽未曾有机会谋面，但和徐编辑常有电邮来往，对他和他的出版社同仁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给予我的一切指点、帮助，我深表感激。

我个人一直认为，专注于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人，多半都在心中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存着一份独特的省思。他们阅读历史，研究历史，无非是想要从过往的兴衰成败中，得出教训，受到启迪。在他们当中，若是有幸掌握着话语权，还希望能藉此去影响当代历史的进程与潮流；对于普通人士来说，虽人微言轻，但一腔情怀也多是赤诚可鉴。从高中毕业直到如今，我虽遵循着父亲当年的期待，一直从事着工程或医学类的工作，远避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来美

国后更是安身立命，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而勉力辛劳，但在我的心底深处，却总是萌动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心绪。出版这本书，也算是对这份心绪作了一种交代，完成了一种“自我启蒙”。“位卑未敢忘忧国”，对于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来说，无论命运如何安排，民族情怀总是一面猎猎飘扬在眼前的旌旗，让人不能无视。

本书的编译终于告一段落，但我对于了解历史真相和细节的努力却绝不会停滞。我也深信，愿意一读此书的读者朋友们，你们的努力也不会停滞。

谨将此书献给我挚爱的家人。没有家人的鼎力支持，也不会有我这本译作的完成。

方激

2011年11月初稿

2013年10月修订

目 录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 1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 / 2

朝廷的屈服 / 9

美国的态度 / 12

帝国海关 / 14

采访李鸿章 / 16

醇亲王的欧洲之行 / 19

李鸿章 / 22

1902年

皇太后回銮 / 40

清国的厘金制度改革 / 44

张之洞兼充督办商务大臣 / 47

1903年

清国教育改革的一些特点 / 52

模范租界 / 60

清国的货币问题 / 66

“少年中国” / 74

1904年

- 赫德爵士与清国的整编 / 82
- 清国的铁路问题 / 88
- “少年中国”被控企图谋杀巡抚 / 98
- 清国的教育 / 100

1905年

- 1904年的清国 / 106
- 清国的确在发生变化 / 112
- 清国学生在日本 / 115
- 清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 117

1906年

- “中国人的中国” / 122
- 一个清国人对于清国未来的看法 / 129
- 清廷大臣出洋考察 / 130
- 进展之中的清国改革运动 / 131
- 一道帝王的诏书 / 135
- 清国的改革运动 / 137
- 改革外务部的需要 / 139
- 清国改革诏书与日本报界的意见 / 142

1907年

- 清国的改革运动 / 144
- 清国改革的实际意义 / 149
- 北京的派系斗争 / 154
- 唐绍仪被弹劾 / 155
- 清国的全国运动对外国贸易者的影响 / 160
- 改变的与改变不了的清国 / 165
- 清国的改革派与反改革派 / 170

1908年

清国的教育和西方著作 / 176

清国的禁烟运动 / 182

清国的困惑和混乱 / 189

清国铁路与外国资金 / 193

清国与它的对外关系 / 199

新的北京 / 209

清国皇帝 / 215

清国已故皇太后 / 223

1909年

一个典型的措施 / 232

西学东渐时期的医学教育 / 237

日本在满洲里的行动 / 241

重访远东 (6) ——清国：财政的泥沼 / 245

重访远东 (11) ——清国：吹皱一池春水 / 251

重访远东 (12) ——清国：新酵素在发酵 / 259

清国的改革——一位死谏者的告白 / 267

张之洞之死 / 271

宪政清国 / 278

清国的自治 / 283

1910年

北京和各省的债务 / 288

清国的各省谘议局 / 295

清国的本土报界 / 302

清国的司法改革 / 306

清国的立宪运动：资政院的任命 / 312

清国的货币改革 / 315

清国国民大会 / 318

清国的改革运动：大局当前 / 320

清国的国家教育 / 327

1911年

签署贷款协议，以满洲里的税收作为抵押 / 334

清国与鸦片贸易 / 336

云南的进步 / 340

清国的货币改革 / 344

保路运动 / 354

赫德爵士之死——非凡的生涯 / 356

武昌起义 / 364

清国的危机 / 368

孙文与康有为在新加坡的一幕 / 372

清国的革命 / 374

袁世凯的回归 / 378

清国的革命 / 382

清国的危机：起源和发展 / 386

袁世凯与列强 / 393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朝廷的屈服

美国的态度

帝国海关

采访李鸿章

醇亲王的欧洲之行

李鸿章

内部改革的问题¹

（本报特派记者，上海，2月7日。）我刚在长江上结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机会获取了一些有关西安府的情形，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清国中央改革派阶层的感受。

一般都认为，如今，朝廷已对极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认了几乎以任何代价换取国际武力从北京撤军的必要性。在逃难的过程中，朝廷忍受了艰难的压力，在漫长的寒冬中，他们沿途见识到那些被饥馑摧残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有的贫穷与肮脏之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极端保守的满人与顽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实的改变。他们时不时地颁发一些极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给西方人的眼睛里糅进些沙子，却不过都是些权宜之计罢了。唯有来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实质性的线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还是具有着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开始议和时，我们坚信列强提出的要求都能够被满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答复，清政府还会同意采取一些内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

1 本文发表于1901年2月25日的《泰晤士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清朝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正因如此，清政府的改革阻力也相应减少了。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从第二年（1901年）开始，试图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并启动了一场号称“新政”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求在历史洪流中得以延续，不致灭亡。

而，当议和真的开始了以后，对于内部改革的提及却被遗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似的，认为只要在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让步，他们那古老的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扰。

李鸿章便是在大力鼓吹这个念头。他指出，一旦恢复和平状态，俄国将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势力。只要俄国的好意得到保证——当然，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证——那么，朝廷便尽可以放心地指望它来保护自己。因此，他不仅劝说朝廷接受“满洲里协议”，而且把“清国政权在名义上保留统治的权力”这种要求，也当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而这一切，也仅仅取决于他个人对于俄国的影响力罢了。或许，他与俄国之间的过从甚密，还可以通过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证据加以佐证：一旦各国公使在北京协商出什么重要决定来，他总是能够迅速、完整地将其通报给朝廷。

在西安府，没有人可以制衡李鸿章的势力。在如今被视作中央政府核心的军机处三要员中，唯独王文韶¹一人具有改革倾向。但是他势单力薄，又被两位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1 王文韶（1830—1908），清末大臣。同治年间任湖南巡抚，光绪年间任兵部侍郎，后任云贵总督。曾奏设北洋大学、铁路学堂、育才馆、俄文馆、西学水师各学堂、上海南洋大学，为国家造就一批人才，其后还曾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政务大臣、武英殿大学士。